

孟子述要



胡天将歸
◎ 刘维业 著

吉林大学出版社

孟子述要

刘维业 著

吉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孟子述要 / 刘维业著. - 长春 : 吉林大学出版社, 2012. 3

ISBN 978 - 7 - 5601 - 8213 - 1

I. ①孟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儒家 ②孟子 - 研究 IV. ①B222.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43934 号

书 名: 孟子述要

作 者: 刘维业 著

责任编辑: 孟亚黎 责任校对: 佟桂先

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开本: 787 × 1092 毫米 1/16

印张: 12.75 字数: 150 千字

ISBN 978 - 7 - 5601 - 8213 - 1

封面设计: 凌 子

葫芦岛华美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

2012 年 3 月第 1 版

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6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社址: 长春市明德路 501 号 邮编: 130021

发行部电话: 0431 - 89580026/28/29

网址: <http://www.jlup.com.cn>

E-mail: jlup@mail.jlu.edu.cn



读懂两部书

(代序)

弘扬我国传统文化,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,有两部书是必须读懂的:一部是《论语》,另一部是《孟子》(以下简称《论》、《孟》)。如果说“六经”(诗、书、礼、乐、易、春秋,“乐经”失传)是中国学术的源头,那么《论》、《孟》则是对源头的拓展。孔子继承并发展了“六经”的基本思想,创立了儒家学说;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学说,使儒家的思想体系更加丰富和完备,成为中国人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理论根据。后人称之为孔孟之道。

(一)

《论》、《孟》就是孔孟之道的载体。这两部书,中国人读了二千多年,特别到了南宋,朱熹编定“四书”,《论》、《孟》分列一、二,元仁宗皇庆二年(公元1313年)，“四书”被钦定为科举用书,从此,《论》、《孟》就成为学子必读的经典,童稚启蒙的教本。可以说,没有任何一部书能得到如此的重视和普及。然而时至今日,对这两部书也没有完全读懂。是内容艰深吗?是智慧不够吗?都不是。



那么,问题在哪里呢?概括起来,我看有这么几条:

一是偏重训诂注疏,缺乏义理探求

训诂注疏,这是义理研究的基础。舍此,连字词的意义都不懂,其它则无从谈起。古代学者在这方面下了极好的工夫,取得了不小的成就,留下了一批传世之作,功不可没呀!相形之下,对义理的探求就显得相当薄弱,直到宋代才开始重视起来。应该说,宋代的读书空气和理论研究空气是很浓厚的,思想也是比较活跃的,涌现出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、张载、朱熹这样一批名彪青史的大学者,形成了濂、洛、关、闽四大学派。但是他们的理论探索,往往是以己意解说经典,构筑自家的理论体系。即使像张载这样以孟子的传人自命的学者,也不能例外。陆九渊的“六经注我,我注六经”,很能说明当时的实际情况。二程所创立、朱熹所发展的宋代理学,标志着儒学独尊的地位已经结束。尽管理学家们仍然举着儒学的旗帜,但在人生的根本问题的认识上已与孔孟不同了。儒学存“人欲”,理学存“天理”;儒学是人学,理学是哲学。陈寅恪先生称他们为“新儒学”,我看也没有说到位,实际上已同儒学分道扬镳了。

二是偏重章句解读,缺乏整体思考

这是研究古代经典常犯的一个大毛病。往往造成断章取义,以偏概全。尤其对《论》、《孟》的研究更容易出现这种偏差。因为孔孟并不是系统地阐述他们的思想,而是有针对性地发表自己的观点。“彼一时,此一时也”,如果不做整体思考,就会误解原意。

比如,过去有人根据孔子讲过“民可使由之,不可使知之”,便断定孔子站在奴隶主阶级的立场上,实行愚民政策。但孔子还讲过“有教无类”、对老百姓要“富之、教之”的话。所以只有联系起来做整体思考,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,对章句本身也才会有符合事实



的理解。实际上，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”，是说对于老百姓来讲，只要求他们能做这件事情，不必要求他们能认识这件事情。

又比如，有人根据孟子对梁惠王讲过，“王何必曰利？亦有仁义而已矣”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）。认为孟子不重视解决老百姓的实际利益问题，甚至给他扣上唯心主义的帽子。如果单从这个话来看，得出这个结论是很自然的。但孟子在另外的场合又讲：“若民，则无恒产，因无恒心。苟无恒心，放辟邪侈，无不为已。”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）恒产，就是有一定的产业；恒心，就是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。孟子认为，如果没有恒产，就没有恒心，就会胡作非为，违法乱纪，什么事都会干得出来。所以他对齐宣王讲：“今也制民之产，仰不足以事父母，俯不足以畜妻子；乐岁终身苦，凶年不免于死亡。此惟救死而恐不赡，奚暇治礼义哉？”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）孟子还说：“圣人治天下，使有菽粟如水火。菽粟如水火，而民焉有不仁者乎？”（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）这就是说，“粮食如果像水火那样充足，老百姓哪有不讲仁爱的呢”？孟子还提出若干政策措施来解决老百姓的实际利益问题。如果我们把孟子在不同场合，针对不同情况所讲的话联系起来做整体思考，那么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：孟子不仅重视物质利益，而且把它放在第一位。这样，孟子头上的唯心主义帽子就可以摘下来了。

萧涤非先生在研究杜甫的时候，采用“以杜解杜”的方法，就是分析杜甫的个别作品，联系他的其它作品，做到互相印证，互相发挥，进行总体思考，这样能比较准确地把握作品的原意，避免片面性。从哲学的角度讲，就是正确处理个别和一般的关系。

三是偏重政治需要，缺乏理论研究

正确处理政治和理论的关系问题，是学术研究的一个根本问



题,也是读懂《论》、《孟》的关键问题。

理论是对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揭示。毛泽东同志说:“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,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,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。”(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三卷)

理论要为政治服务,政治要服从理论的指导,把理论作为政治路线的思想基础。政治的需要推动和促进理论的发展,但不能改变理论的品格。事实上,由于政治需要而曲解、否定、甚至打倒某种理论,从古至今都有这种情况。《论》、《孟》就遭受过这种灾难和不幸。

最早改变《论》、《孟》思想本质的,是西汉的董仲舒。他根据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需要,对孔孟之道主要有两点改变:一是关于君臣关系问题。这一直是儒家关注的政治课题。孔子当年提出:“君使臣以礼,臣事君以忠。”(《论语·八佾》)君臣关系是使用和服事的关系,不过这种使用要受到礼的规范和约束,国君不能为所欲为,想怎么办就怎么办。实际上是对君权的一种限制。孟子比孔子进了一大步,他对齐宣王说:“君之视臣如手足,则臣视君如腹心;君之视臣如犬马,则臣视君如国人;君之视臣如土芥,则臣视君如寇仇。”(《孟子·离娄下》)在孟子眼中,君与臣虽然地位和权利不同,但在人格上是平等的。董仲舒则提出“三纲”,即“君为臣纲,父为子纲,夫为妻纲”,在东汉初年的白虎观会议中正式确定下来,成为封建道德的理论基础。二是关于天和天人关系问题。在孔孟那里,天的含义,有时指自然之天,有时指义理之天,有时指命运之天,却没有主宰之天。天人关系,有时指人和自然的关系,有时指主观和客观的关系。到了董仲舒那里,天就是主宰人事的神,天在地



上的代表是天子。天人关系就是统治和被统治,主宰和被主宰的关系。所谓“天人合一”,实际上就是君权和神权的合一。

君臣关系和天人关系问题,这是事关巩固封建统治地位的基本问题。正是在这两个基本问题上,董仲舒改变了孔孟之道。

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从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政治需要出发,对孟子的重民思想彻底否定,并明令将《孟子》一书中有关重民思想的章节全部删去,书名改为《孟子节文》,何其霸道!这是利用至高无上的皇权对理论实行践踏。

到了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时期,陈独秀出自推进思想和社会变革,提出“全部十三经不容于民主国家者盖十之九九,此物不遭焚禁,孔庙不毁,共和招牌,当然持不长久”。《论》、《孟》自在焚禁之列。当年由于革命的紧迫,来不及加以具体区分,只好将水和婴儿一起泼掉了。

“文革”期间,举国上下批林批孔批《论语》,对《论语》进行有史以来最全面、最彻底的否定,根本就不允许进行什么理论研究,只能批判否定。当年有一本比较流行的《论语批注》,把《论语》定性为“反动没落阶级的复辟经,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大杂烩,毒害人民的大毒草”。这个《批注》虽然出自北京大学 1970 级工农兵学员之手,但它表达的却是“四人帮”的反动意志。我在《论语指要》中说:“这本《批注》,我现在还保存着,作为反面教材,提醒我要记住我国传统文化曾经遭受过如此的摧残和践踏。”

四是偏重阶级分析,缺乏人性观念

在阶级社会里,人有阶级性,也有共性。进步的思想学说,往往既反映阶级的利益和要求,也反映人类的共同利益和要求。《论》、《孟》就是这样。对一种理论学说,进行阶级分析是毫无疑问的。这



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。但阶级分析不能简单化、庸俗化和绝对化。在过去一段时间里,把《论》、《孟》所讲的一些义理,比如关于人类共性问题,冠以“超阶级”而加以否定;把孔孟立下的基本道德规范,冠以“封建”而予以彻底批判,实行彻底决裂。这怎么得了!岂不知《论》、《孟》所讲的义理德范,是中国人立国做人的根基,具有普世性价值。这是应该进一步开掘和发扬的。

读懂《论》、《孟》这两部书,实际上就是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孔孟之道。

(二)

什么是孔孟之道?《论语》记载孔子曾两次告诉弟子“吾道一以贯之”。这个“一”就是“仁”。“仁”,是儒家的旗帜。坚持“仁”,就是坚持儒家的根本;背离“仁”,就从根本上背离了儒家。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“仁”的学说,将“仁义”并论。什么是“仁”?孔子说:“爱人。”(《论语·颜渊》)他还说:“泛爱众,而亲人。”(《论语·学而》)孟子突出民,他说:“亲亲而仁民,仁民而爱物。”(《孟子·尽心上》)“仁也者,人也。合而言之,道也。”所谓“合而言之”,就是把人和仁结合起来,以“仁”指导和规范人类的一切活动,包括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这就是孔孟之道。概括地说,孔孟之道,是关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思想理论,是我国古代的人道主义。其具体内容主要涵盖三个方面:一是,人应当成为怎样的人?二是,人生应当怎样度过?三是,人类应当怎样生活?

孔孟之道论做人:有理想,有道德,有人格,有智慧

孔子说:“志于道,据于德,依于仁,游于艺。”(《论语·述



而》)这是做人的总纲,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大文章。这里所说的道,相当今天所说的真理。“志于道”,就是要树立追求真理的志向。古人所说的志,就是今人所说的理想。孔子说:“三军可夺帅也,匹夫不可夺志也。”(《论语·子罕》)这句话,几千年来一直铭刻人心,历代有识之士无不强调志向对人生的意义。道是人生追求的目标,德是思想品格,艺是技术技能,德和艺是实现目标的行为和途径,仁是总的指导原则。

在人的发展方面,孔孟都把德放在第一位。孟子认为人而无德,则和禽兽差不多。他说:“人之有道也,饱食、暖衣、逸居而无教,则近于禽兽。”(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)孔子当年面对道德沦丧的社会现实,忧心忡忡,奋起重振,提出了以“仁”为核心的若干具体道德规范,其中主要有:孝、悌、忠、信、恕、义、恭、宽、俭、让、敏、敬,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道德理论体系,在我国伦理思想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。孔子的道德理论和实践的显著特点,既讲现实主义,又讲理想目标;既讲阶级性,又讲人性。孝悌忠信是孔子倡导的基本道德。

人格问题,是孔孟特别关注的,孟子尤甚。他讲过一段深切著名的话:“鱼,我所欲也,熊掌亦我所欲也;二者不可得兼,舍鱼而取熊掌者也。生亦我所欲也,义亦我所欲也;二者不可得兼,舍生而取义者也。”(《孟子·告子上》)这里所说的义,就是指人格尊严。孟子把尊严和骨气看得比生命还重要。人要活得有尊严,有骨气。所谓士可杀而不可辱,就是这个道理。人生的追求不仅仅是物质生活,还有精神境界。他说:“士穷不失义,达不离道。”(《孟子·尽心上》)大丈夫“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”(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)。



孔孟倡导的这种人格气节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。古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，今有朱自清宁可饿死也不领美国的“救济粮”，闻一多宁可倒下去也不向反动势力屈服。这就叫骨气，这就叫尊严，这就是人格。毛泽东同志说：“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。”这种“骨气”，就源自孔孟之道。

做人不能没有智慧。所谓智慧，实际上就是认识 and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。孔子是怎样理解智慧的呢？他说：“知者不惑，仁者不忧，勇者不惧。”（《论语·子罕》）孔子告诉人们，有智慧的人对任何问题都没有疑惑，不被迷惑。他到了四十岁才达到这一点。孔子特别注重政治智慧。樊迟问知，子曰：“知人。”樊迟不大明白，孔子又进一步告诉他，“把正直的人提拔起来，安排在不正派的人之上，使不正派的人也变得正派起来，这就是智慧”。樊迟还是不明白。他从孔子那里出来，去问子夏。子夏告诉他，“老师的话内容多么丰富呀，舜有了天下，通过在群众中选拔，把皋陶任用起来，不仁的人远离而去。汤有了天下，通过在群众中选拔，把伊尹任用起来，不仁的人远离而去”。这段问答，绘声绘色，孔子言简意赅，樊迟憨厚愚钝，子夏聪慧灵敏，一一跃然纸上。

为了培养有理想、有道德、有人格、有智慧的人，孔孟提出一套关于修养方法与修养境界的理论。他们就什么是修养、为什么要修养、怎样修养以及修养要达到怎样的境界等问题，提出了许多精湛的观点，成为儒家学说的辉煌篇章，对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，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和普世价值，值得我们学习、开掘和发扬。

在道德修养问题上，孔孟都特别强调自觉、自律和践行。

修养的关键靠自觉，靠自身的努力。孔子说：“为仁由己，而由



人乎哉？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孟子又进一步提出了自觉的理论根据。他说：“仁义礼智，非由外铄我也，我固有之也，弗思耳矣。故曰：‘求则得之，舍则失之。’或相倍蓰而无算者，不能尽其才者也。诗曰：‘天生蒸民，有物有则，民之秉彝，好是懿德。’孔子曰：‘为此诗者，其知道乎！物必有则；民之秉彝也，故好是懿德。’”（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）孟子指出，所以要靠自觉，要靠主观努力，是因为道德这个东西属于“求则得之，舍则失之”，不决定于客观。他有一句名言：“万物皆备于我矣。”过去不少哲学家认为，这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表述。其实不然，所谓“万物”，是指仁义礼智，属于“求在我者也”。孔孟都认为，追求人格完善，是人们的精神需求，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。

孟子还指出自觉在道德修养中的重要性。他说：“君子深造之以道，欲其自得之也。自得之，则居之安；居之安，则资之深；资之深，则取之左右逢其源，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。”（《孟子·离娄下》）这里所说的自得，就是今天所说的自觉。只有自觉地去，最终才能达到左右逢源。

修养必须严于律己。孔子说：“躬自厚而薄责于人，则远怨矣。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孟子讲的更具体。他说：“爱人不亲，反其仁；治人不治，反其智；礼人不答，反其敬——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。”（《孟子·离娄上》）这就是说，“我关爱别人，可是别人并不亲近我，那就得反问自己，关爱还不够吗？我管理别人，可是却没有管好，那就得反问自己，知识和智慧还不够吗？我有礼貌地对待别人，可是得不到相应的回答，那就得反问自己，恭敬还不够吗？任何行为得不到预期的效果都要反躬自责”。

不严格要求自己，遇到问题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，总把责任推



到别人身上,这是很难进步的。孟子说:“君子之守,修其身而天下平。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——所求于人者重,而所以自任者轻。”(《孟子·尽心下》)

严于律己不仅是孔孟提出的道德规范,也是道德修养的重要途径和方法。美德是在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中养成的,缺点和错误的产生往往由于对自己要求不严。孔孟和他们的弟子很懂这个道理。曾子讲:“吾日三省吾身——为人谋而不忠乎?与朋友交而不信乎?传不习乎?”(《论语·学而》)

道德修养的根本在于践行。这是孔孟一贯的主张。

孔子平素要求弟子“敏于行”,并以此作为君子的一个标准。他说:“君子欲讷于言,而敏于行。”(《论语·里仁》)子贡问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君子?孔子告诉他:“先行其言而后从之。”(《论语·为政》)要先做,做到了然后再说。他还说:“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。”(《论语·宪问》)说得多,做得少,君子以为耻。这些话是告诉人们,道德修养是要见诸行动的。孔子为弟子不能躬行,常常感到忧虑。他说:“德之不修,学之不讲,闻义不能徙,不善不能改,是吾忧也。”(《论语·述而》)

孟子则把践行的重要作用讲到了极至,指出圣人和一般人、好人和坏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做什么。他说:“舜之居深山之中,与木石居,与鹿豕游,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;及其闻一善言,见一善行,若决江河,沛然莫之能御也。”(《孟子·尽心上》)这就是说,舜所以超出一般人,就在于他对善言善行,能够虚心学习并付诸实践。他还说:“鸡鸣而起,孳孳为善者,舜之徒也;鸡鸣而起,孳孳为利者,跖之徒也。欲知舜与跖之分,无他,利与善之间也。”(《孟子·尽心上》)所以,孟子倡导人们向舜学习,同大家一道去



做善事。“大舜有大焉，善与人同，舍己从人，乐取于人以为善。自耕稼、陶、渔以至为帝，无非取于人者。取诸人以为善，是与人为善者也。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。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

道德修养是无止境的。孟子讲过一段寓意深长的话：“孔子登东山而小鲁，登泰山而小天下，故观于海者难为水，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。观水有术，必观其澜。日月有明，容光必照焉。流水之为物也，不盈科不行；君子之志于道也，不成章不达。”（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）修养好比登山，登高才能望远，不同的高度有不同的境界；好比观水，见到大海的人，别的水就不放在眼里了；好比学习，在圣人之门学习过的人，别的言论就难于吸引他了。修养要像太阳、月亮那样，光辉普照每一个空间；要像流水那样，不把坑洼流满，不往前流。道德修养要达到一定的境界、一定的水准。

圣人是最高境界，仁人为其次。孟子也认为，“圣人，人伦之至也”（《孟子·离娄上》）。圣人、仁人，最早是由孔子提出来的。但在他那里，不过是虚悬的理想而已，是可望而不可及的。

什么是圣人？什么是仁人？孔子都没有下过定义，只是讲一些主要特点。例如，子贡曾问孔子：“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，何如？可谓仁乎？”孔子回答：“何事于仁！必也圣乎！尧舜其犹病诸！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看来，孔子把圣人的标准定在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上。弟子称孔子为圣人，他不敢当，甬说圣人，就是仁人也自觉不够格。他曾说，“若圣与仁，则吾岂敢！抑为之不厌，诲人不倦，则可谓云尔已矣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。子贡则说：“学不厌，智也；教不倦，仁也。仁且智，夫子即圣矣。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按照孔门弟子的解释，所谓圣，仁智而已。张岱年先生认为，这个解释同“博施于民而能济众”是相通的。“博施是仁，济众靠智”（《中国伦理思想研



究》)。

圣人难求,仁人也是如此。孔子认为进入仁的境界,也不是朝夕之功,所以他不轻易以仁许人。令尹子曾三次做楚国的令尹(宰相),每次都没有喜悦的表情,三次被免职,也没有什么怨恨。每次被罢官,总是把自己的一切政令毫不保留地告诉接任者,做到有始有终。对这样一个人,孔子只说他尽职尽责,至于仁人,还够不上。孟武伯曾问孔子,子路有没有仁德?孔子说,子路可以担任千乘之国的军事长官,至于他有没有仁德,我不知道。又问冉求怎么样?孔子说,冉求可以当千户人口的县长,至于他有没有仁德,我也不知道。还问公西赤怎么样?孔子说,公西赤可以做负责接待外宾、办理外交事务的官员,至于他有没有仁德,我还说不知道。孔子认可的仁人,在殷商只有三位。《论语·微子》记载:“微子去之,箕子为之奴,比干谏而死。孔子曰:‘殷有三仁焉。’”

孔子认为,君子是一个比较可行的道德境界。所以,他把君子作为道德修养的现实目标。但并不是终极目标。

究竟什么是君子?孔子讲了很多条,什么“君子食无求饱,居无求安”;什么“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”;什么“君子周而不比,小人比而不周”;什么“君子之于天下也,无适也,无莫也,义之与比”等等。在这诸多条件中,孔子把“敬”作为君子的基本条件。当子路问怎样才能成为君子时,他首先讲“修己以敬”。什么是“敬”?孔子也没有下过定义,只是提出一些具体要求。他说:“居处恭,执事敬。”(《论语·子路》)还说过:“道千乘之国,敬事而信,节用而爱人,使民以时。”(《论语·学而》)由此可见,“敬”是严肃认真的意思,是一种工作态度。用今天的话说,就是一种敬业精神。“敬”还是对人、对客观事物的态度。孔子说:“君子有三畏:畏天



命，畏大人，畏圣人之言。”（《论语·季氏》）这里所说的“畏”，是敬畏，钱穆先生认为畏与敬相近，与惧则远。敬畏，不是一般的敬，而是怀有崇高的敬意。对规律、对德高位重的人、对真理，要有特殊的敬重，这种敬重带有尊重服从的意义。

有没有比“敬”更高的呢？有，“安人”，就是有利于他人。有没有比“安人”更高的呢？有，“安百姓”，即普天之下的老百姓都能得到安乐。这就是圣人的境界。进入这个境界要从做君子开始，首先要做到“敬”。

孟子比孔子的气魄大。他对做君子问题谈得不多，叫得最响的是“人皆可以为尧舜”。从此，“圣人”不再是一个虚悬的理想，而是具体的修养目标，是可以追求的修养境界。当然，孟子所说的“人皆可以为尧舜”，不是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，而是要以尧舜为榜样，学习尧舜的品德，像尧舜那样做人做事。孟子曾对他的弟子曹交说过，“尧舜之道，孝悌而已矣。子服尧之服，诵尧之言，行尧之行，是尧而已矣”（《孟子·告子下》）。

孟子还开辟了修养的新境界，提出做“大丈夫”、“善养浩然之气”，极大地丰富了儒家的修养理论。

什么是大丈夫？当时有人说公孙衍和张仪是大丈夫，他们一发脾气，诸侯都害怕，天下便太平无事。孟子认为他们够不上大丈夫。他说：“居天下之广居，立天下之正位，行天下之大道；得志，与民由之；不得志，独行其道。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此之谓大丈夫。”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）在孟子看来，大丈夫不是地位高，财富多，而是有高尚的道德情操，是一种崇高伟大的人格。

什么是“浩然之气”？孟子说：“难言也，其为气也，至大至刚，以直养而无害，则塞于天地之间。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他感到这



种气最伟大、最刚毅、最强劲。只要很好地培养它，就会充满天地之间，至于更深的道理，很难用语言来表达。今天看来，这种浩然之气，就是一种精神状态，是一种气节和操守。南宋文天祥说：“况浩然者，乃天地之正气也。”他写了一首《正气歌》，对它做了形象的解读：“天地有正气，杂然赋流形。下则为河岳，上则为日星。于人曰‘浩然’，沛然塞苍冥。……是气所磅礴，凜然万古存。当其贯日月，生死安足论。地维赖以立，天柱赖以尊。”

在中国古代修养论中，孔孟之道占有重要地位，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。尽管不同时代、不同阶级，修养的目标和途径各不相同，但也面临一些共同的问题。例如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，个人与国家的关系，知与行的关系，理想与现实的关系，等等。在处理这些问题时，孔孟之道提出了一些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原则，特别是关于培养美德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思想观点，人民群众对合乎规律的事情普遍认同的思想观点，可以说达到了顶级的认知高度。

孔孟之道论人生：终身学习，肩负责任，有所作为

人生应当怎样度过？这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。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有一部风行一时的书，叫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这部书的主人公保尔·柯察金说过一段话：“人，最宝贵的是生命；它，给予我们只有一次。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：当回忆往事的时候，他不因虚度年华而痛悔，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；在临死的时候，他能够说：‘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，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——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。’”这段话，在当时青少年的心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。

二千多年前的孔孟是怎样告诉人们的呢？他们认为，人的一生是学习的一生，是肩负责任的一生，是有所作为的一生。